

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及其 对中国理学思想的解读

桑 靖 宇

[摘要] 莱布尼茨继承了中世纪的神学理性主义思想，并加以彻底理性化，使上帝成为理性秩序的化身，从而无需干涉世界。正是这种独特的神学思想使莱布尼茨在中国理学思想中找到了强烈的共鸣，即理性主义的天道观和有机的自然论。莱布尼茨关于中西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构想，在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

[关键词] 神学理性主义；上帝；单子；理；气

[中图分类号] B51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9)06-0722-05

当 17 世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关于中国文化是否与基督教相通融的争论传到欧洲本土时，引起了欧洲文化界对中国思想的极大兴趣，以至于谈论中国成为了 18 世纪知识界的一大时尚。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激进的自由思想家还是保守的神学家，基本上都认为中国儒学类似于斯宾诺莎的无神论，与基督教是相冲突的，因而对之或褒或贬。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却认为中国儒学是一种自然神学，与基督教是相融合的，主张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可在自然神学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互相交流，以促进全人类的福祉。他的上述思想集中表现在去世前夕（1716）所著的《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一书中。莱布尼茨为何会力排众议，采取这种宗教融通主义（religious accommodationism）的态度呢？要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先从他本人的神学思想说起。

一、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

17 世纪的欧洲处于严重的宗教冲突之中，天主教和新教的尖锐对立四处蔓延，1618—1648 年的 30 年战争更是使德国处于一片瓦砾之中。莱布尼茨自青年起就有个坚定的信念，即只有在天主教与新教的和解及统一的基础上德国才能摆脱割据走向富强，也只有如此欧洲才能真正实现和平和繁盛，从而基督教各教派的统一构成了他毕生的努力目标（无论是政治活动上还是学术思想上）。他的神学、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试图为基督教的教派统一提供一个基于理性的、各方都能接受的理论基础。

莱布尼茨 1668 年的《天主教证明》（Catholic Demonstrations）为我们勾画出了他的力图给欧洲带来和平的宏大计划的大致轮廓。该计划有三个部分及一个导论。第一部分，关于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的证明，即自然神学；第二部分，关于基督教信仰或启示神学的证明；第三部分，关于普遍教会及圣经权威的证明。莱布尼茨认为，必须有一个导论来为这些证明奠定基础，该导论具有某种百科全书式的性质，包括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等基本原则^[1]（第 109 页）。1686 年的《形而上学论》（其成熟思想的标志）即是该导论的一个重要工作。莱布尼茨的具体思想虽然屡经变化，但他终其一生都未偏离《天主教证明》的基本思路。

莱布尼茨的神学思想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 即使是(由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而)不能为理性所直接证明的启示神学的信仰, 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圣餐等在他看来也是与理性不冲突的。他认为只有在理性的基础上基督教各教派才能克服分歧, 达成共识, 从而为世界带来永久的秩序。下面我们将论述莱布尼茨自然神学(即能为理性所直接把握的神学部分)的主要思想。

处于莱布尼茨自然神学核心的是神学理性主义(theological intellectualism)的上帝观念, 即上帝的理性是高于意志的, 而对各种神学意志主义(theological voluntarism)的批评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的上帝观念可简单归结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 上帝作为最完善的存在, 其行为都服从理性的指导。与神学意志主义者极力推崇上帝意志的至高无上性截然不同, 莱布尼茨认为: “任何意志都包含了意欲的理由, 而这理由自然是高于意志的”《形而上学论》第2条)^[2](第55页), 即上帝的理智是优先于意志的。为了避免陷入斯宾诺莎式的决定论, 莱布尼茨认为, 在上帝的理智之中存在着无数的可能世界, 上帝的意志根据最佳者原则选择理性所指明的最佳世界, 并使其现实化。这样, 莱布尼茨认为尽管上帝的意志行为是为理性所决定的, 但在逻辑上上帝做其他选择并无矛盾, 因此上帝的意志仍是自由的。

第二, 由于其全知、全能, “上帝对整个宇宙就只有一道命令, 用这道命令他就决定了允许整个宇宙由可能性而进入现实性”^[3](第77页)。上帝无限的理智使其在创世时一次性地赋予了世界以尽可能完善的理性的秩序。上帝创世之后只需维系事物的存在, 而不用干涉事物的进程, 因为上帝赋予了事物以它们所可能具有的最高的完善性, 使它们可以按照上帝所规定的秩序自发运行。

第三, 与自然神论者不同的是, 莱布尼茨承认神迹的存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上帝作为超世界的理智(supramundane intelligence)需要干涉世界。在他看来, “神迹虽然违背了(人们有限的理智所认识的)低等的规则, 但却服从于普遍的秩序。……既然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有秩序的, 那么神迹就跟自然事件一样有秩序。”《形而上学论》第7条)^[2](第58页)。因此, 莱布尼茨的世界是彻底理性化的, 上帝不是莫测的神秘力量, 而是理性秩序的化身和保证。

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上帝观对他的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种不干涉的上帝导致了他的有机论的世界观, 即世界是能动的, 能够按照(上帝创世之初赋予)自身的规律自发地运作。由此出发, 莱布尼茨批判了近代占主导地位的机械论的、僵死的物质观, 认为无论是笛卡儿派的广延还是伽桑狄、牛顿学派的不可分的原子均不能说明物质世界的有规律的守恒运动, 物质的本质必须是某种能动的力。在其晚期思想中莱布尼茨把这种能动的力归结为精神性的单子, 认为只有单子才是自足的个体实体, 而符合机械论原则的物质只是彩虹般的现象。由于单子是彻底自足的, 不受外界的任何作用和影响, 从而单子之间以及单子与物质现象之间的关系就不是现实的相互作用, 而是上帝创世之初所预定的“前定和谐”。

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精神还鲜明地表现在他对“上帝之城”的普遍化的理解上。上帝之城本是奥古思丁提出的宗教政治学概念, 是指与世俗城邦截然不同的基督教会。但莱布尼茨突破了这种宗教上的狭隘性, 认为所有人类的全体构成了上帝之城。莱布尼茨极大地淡化了基督教的原罪说, 认为人作为上帝的肖像被赋予了理性能力, “能够认识宇宙的秩序, 并在一定程度上能通过例如建筑来模仿它, 每一心灵在自身领域内就像是个小神”《单子论》第83条)^[2](第280页), 从而都是上帝之城的成员。当然, 莱布尼茨的这种思想并非是要彻底取消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区别, 而是指每个人都可以凭借理性的正确使用而认识到上帝的存在, 而信仰只是完善人的这种自然神学的理性认识而已。

总的来说, 莱布尼茨虽然终身都坚持路德教徒的身份, 但其神学思想更接近于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的神学理性主义传统, 是对经院哲学与近代哲学加以综合的理性的创造性尝试。这使得他在反经院哲学蔚为潮流、神学意志主义普遍流行的早期近代显得颇为异类, 他的教会再统一的宏大规划最终只能流于空想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莱布尼茨对中国思想(理学)的解读

(anti-accommodationism) 的一个批判性的回应。值得注意的是, 莱布尼茨在该书中所提到的中国思想资料基本上转引自龙华民、利安当的相关著作, 也沿袭了他们的错误, 如把“理”、“太极”等理学思想误认为是属于先秦儒学的。限于篇幅, 本文将重点讨论莱布尼茨是如何以其神学理性主义来解读理学思想的。

龙华民、利安当等人认为中国思想中缺乏作为人格神的上帝, “理”、“太极”虽貌似基督教的上帝, 但实质上只是原始物质(prime matter)而已, 中国人根本就没有精神实体的概念。但莱布尼茨却从他们关于中国思想的引文中看到了类似于他的上帝观念的东西。

莱布尼茨对把“理”视为是原始物质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根据[中国人], ‘理’或‘太极’即是至善的‘太一’, 毫无任何杂物的纯善, 既纯又善的本体, 造成天地的本源, 至高的真理。‘理’本身既是力而不限于本身; 又为了与众沟通而造了万物, 它是纯德与爱之源。它的原理即是造万物, 而众善都出乎它的要素与本性。……我们可以假定‘理’、‘太极’或‘上帝’是有灵性的, 能洞悉一切、知道一切, 做一切的。那么, 中国人不可能同时说这么多好, 并且又相信它无用处, 无生命, 无意识, 无灵性, 无智慧, 而不现出矛盾”^[4] (第 79 页)。即“理”作为创造、主宰万物的能动性的纯善与经院哲学的纯被动性的原始物质恰恰是截然相反的, 倒是类似于基督教的“上帝”。

莱布尼茨进而指出: “若是中国古典作者否认‘理’或第一本原有生命、知识、力量, 他们指的, 无疑是有人形的、存在于受造物身上的[生命、知识、力量]。他们指的生命, 是感官的活力、知识, 是理性或体验带来的知识、力量, 使王子或官吏通过威严和希望而管辖庶民时的势力。”^[4] (第 83 页) 按照他的解释, 中国人之所以否认“理”具有生命或力量, 是反对将最高实在拟人化, 这一思想与伪狄奥尼索斯的“否定神学”是一致的, 这并不表示“理”不是能动的精神实体。

反通融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 “理”产生万物, 并不出于意志或计划, 而是表现为自然律, 万物依照这自然规律而产生、运动, 无需外在的干预。例如培尔(Bayle)和马勒布朗士等深受笛卡儿哲学影响的神学意志主义者(theological voluntarianist)认为, 如果自然规律是由神的理性所规定的, 那么自然就有了某种独立性, 神的万能也就受到损害。从而, 他们认为, 自然界并没有自在的规律, 一切都处于神的意志的掌握之中。也正因此, 崇尚客观秩序的中国理学思想被培尔、马勒布朗士、龙华民等神学意志主义者视为是斯宾诺莎主义、即无神论的典型。

如前所述, 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是与神学意志主义正相对立的, 他认为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神学意志主义只会造成宗教与科学间的对立以及加剧教派之间的冲突。他很自然地把“理”通过自然规律产生万物的理学思想引为同道, 认为“理”正是他所理解的不干涉的、理性的上帝。如前所述, 莱布尼茨是用“可能世界”的理论来调和神的万能与客观的自然规律、神的意志与其理智之间的张力, 同样, 他也用这种“可能世界”的学说来解释理学思想: “我相信我们不用违背中国人古代的学说, 即可说‘理’凭着本身的完美而从多种可能性中选择最妥善的一种, 因而产生‘气’或物质, 但[气]因备有其本能, 而使其他的[万物]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中国人非但不应受责备, 而且他们的事物因自然本性和预定规范而产生的这项理念, 实在值得受人称扬。”^[4] (第 86 页)

理学思想中引起莱布尼茨强烈共鸣的不仅仅是通过理性秩序来统御世界的“理”, 还有世界的有机性。实际上, 早在与来华传教士白晋的通信中(1697—1698 年), 白晋就指出莱布尼茨的物质本质是力的有机论哲学与中国思想有着显著的类似。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中, 莱布尼茨则直接用他的单子—物质模式来解释理学的理气关系。在该书第 14 条莱布尼茨说道: “这位作者[朱熹]很聪明地指出, 鬼神不仅仅是气, 而是气之力。如果孔子对他的一个学生说鬼神仅仅是气, 他指的是有活力的气, 并且是因为这位学生的理智能力不能理解精神实体, 才因此而因材施教。对希腊人、拉丁人来说, Pneuma 和 Spiritus 意味着空气, 那是一种微妙的、有穿透力的物质, 被创造的精神实体实则被其所覆盖。同一作者(指朱熹)还提到鬼神即理。”^[5] (第 87 页)

莱布尼茨尽管对理学思想存在着误解——如将理与鬼神等同起来, 并将它们都视为是精神实体, 但最难可贵的是, 他不但反对龙华民、利安当将理视为是惰性的原始物质的谬误, 还进一步觉察到气也非

僵死的原始物质,而是“微妙的、有穿透力的”、生机勃勃的东西,类似古代西方人所说的空气。莱布尼茨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理解显然与其自身的有机论哲学观密不可分。在他看来,物质的本质既非是广延,也非是不可分的原子,而是能动的力,物质的力源于与其结合在一起的能动的精神实体——单子。莱布尼茨认为朱熹的理是类似单子的能动的精神实体,它赋予了气以活力和生机。“(朱熹还认为),事物除了精粗、厚薄之外,并无其他差别。他想说的,显然并非理或鬼神是物质性的,而是这些物质为鬼神所赋予生机,那些与不那么粗糙、不那么厚重的物质结合在一起的(理或精神实体)就更为完善了。……个别的理是那伟大的理的(比照着他们躯体的)不同完美程度的散射(emission)。因而事物的不同与他们物质的微妙性与粗重程度成比例,因为理本身与它们(指理所依附的物质)相对应。”^[5](第88页)莱布尼茨从朱熹的理气不离以及事物因气的清浊、厚薄不同而不同中再次看到了他自己的哲学。莱氏认为,除了作为最高单子的上帝之外,任何被创造的单子都因不同程度的模糊的知觉而与相应的物质躯体相伴随,越高级的单子的物质躯体越精细。正是这种心物不离的有机论哲学观使得莱布尼茨得以克服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及其僵死的物质观,使得物质得以分享了精神的活力和生机。

莱布尼茨的这种有机论哲学思想受到科学史家李约瑟的大力赞赏。李约瑟将莱布尼茨视为是现代西方有机论思想的直接先驱,并猜测他的有机论哲学可能是受到中国思想的启发:“当它(有机论思想)来临的时候,人们发现一系列的思想家已经为它准备了道路——从怀特海回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回溯到莱布尼茨——然后大概灵感就不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益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地方,比这世界已经意识到的要更多。”^[6](第505页)李约瑟的这一设想固然令人振奋,但正如本文所分析的,莱布尼茨的有机论哲学是有其自身的思想根源的,即对上帝进行充分理性化的结果——上帝对世界的不干涉使得世界按照自身的规律和动力运作。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有机论思想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宗教转换的结果——即对上古的人格神加以理性化,这一过程在理学思想中达到顶峰。

值得一提的是,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态度与他的理性主义的“上帝之城”的思想也颇有关系。在他看来,既然中国思想通过理性认识到了上帝的存在,那么中国人就现实地是上帝之城的成员,从而他的基督教会统一计划就进一步扩大到把中国也包括进来。他热情地指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中国。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7](第1页)莱布尼茨尤其对中国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哲学推崇备至, he说道:“鉴于我们目前面对的空前的道德没落状况,似乎有必要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给我们传授如何应用和实践自然神学,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向他们传授启示神学一样。”^[7](第6页)

三、结语

以上从莱布尼茨的相关著作出发,扼要地论述了他的神学理性主义及其对中国(理学)思想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即理性主义的天道观和有机的自然观。实际上,尽管在莱布尼茨哲学与朱熹理学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差异,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比他所知道的多得多:如在认识论上,莱布尼茨既认为一切观念都是天赋的,又主张经验的“助缘”对于认识天赋观念的重要性,这与朱熹的“心具众理”、“格物致知”的思想若合符节;在伦理学上,他们都很推崇理性认识对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在政治哲学上,他们都强调德性的首要地位,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在今天看来,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阐释有着明显的不足,如资料的局限性,较浓厚地将中国思想套入西方框架的西方中心论的痕迹。但莱布尼茨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坚信人类有着共同的天性和基于自然的理性,因而文化间在差异的表象之下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他用自己卓越的才智在当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揭示了中西文化间的契合。正如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艾田蒲所说:“在1700年前

后,关注中国的人之中,莱布尼茨无疑是最了解实情、最公平合理的一个,他的著作也是唯一一部我们今天还可以阅读的著作。”^[8](第 385 页)

反观当代的文化比较,人们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似乎更注重文化间的差异性,但莱布尼茨注重寻找文化间共识的努力是值得人们重视的。对莱布尼茨而言,这种文化间的契合绝不仅仅是空洞的思想而已,他穷其一生的努力都是在政治、外交、文化等多方面社会活动中,试图缔造一个基于人类共同的理性(即自然神学)的人类共同体,将破碎的欧洲整合起来,并进而使欧洲和中国能够紧密联合,取长补短,通过发扬人的理性和科学精神,消除世界上的各种混乱和纷争,建立一个极大地促进人类福祉的新世界。莱布尼茨的宏伟构想固然失败了,他的普遍理性主义思想也不免忽视了文化间的差异,但是一个有希望的人类未来除了建立在文化间的共识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如果我们不愿赞同亨廷顿的文明间必然冲突的理论的话,那么莱布尼茨关于东西方文化大融合的宏伟构想就仍不失为我们努力的方向。

[参 考 文 献]

- [1] Leibniz, G. W. 1969. *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eory E. Loemker.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 [2] Leibniz, G. W. 1998. *Philosophical Text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 S. Woolhouse and Richard Franck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 [德] 莱布尼茨、[英] 克拉克:《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 [4] 秦家懿:《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1993 年版。
- [5] Leibniz, G. W. 1994. *Writings on China*. Translated by Daniel J. Cook, Henry Rosemont.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 [6] Needham, Joseph. 1956.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 2*.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 [德] 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杨谦立、杨保均译,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5 年版。
- [8] [法] 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册,钱林森、许钧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责任编辑 涂文迁)

Leibniz' s Theological Intellectualism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Neo-Confucianism

Sang Jingyu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Leibniz inherited and rationalized the theological intellectualism of the Scholasticism. To him, God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rational order of the world, and will not intervene the world. This rational theology makes Leibniz find confirmation within Chinese Neo-Confucianist thought, the national providence and organic world view. Leibniz' s idea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West and China is still relevant to our contemporary world.

Key words: theological intellectualism; God; monad; *Li*(理); *Qi*(气)